



高校教材

陈勤建 著

中国民俗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民俗学

陈勤建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学/陈勤建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617-5517-4

I. 中... II. 陈... III. 民俗学-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9769号

中国民俗学

著 者 陈勤建
项目编辑 曹利群
文字编辑 姜汉椿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5.25
字 数 291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517-4/C·157
定 价 25.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绪论：现代中国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和民俗学科的兴起	1
第一章 何谓民俗	22
第一节 民俗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相	22
第二节 民俗是一种文化模式	25
第三节 民俗是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	28
第二章 民俗的发生	30
第一节 征服自然与发展生产的需要	30
第二节 种族繁衍及发展自身的要求	35
第三节 民众群体心理的认同	38
第四节 统治阶级思想的渗透与衍化	44
第三章 民俗的表层特征	48
第一节 不成文(法)的规矩	48
第二节 程式化的规矩	51
第三节 民众群体的规矩	54
第四章 民俗的深层结构	60
第一节 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	60
第二节 文化与生活的双重复合	63
第三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	66
第五章 民俗的性能	70
第一节 法约性	70

第二节	软控性	73
第三节	本位偏移性	75
第六章	民俗的传播	79
第一节	超时空的传承	79
第二节	传承中的变异	82
第三节	传播的载体与方法	88
第七章	中国民俗的特点	94
第一节	稚拙古朴 源远流长	94
第二节	神秘奇异 巫术性强	97
第三节	礼俗混同 封建味浓	100
第四节	丰富多彩 注重实用	104
第八章	中国民俗的分类	110
第一节	中国有形物质民俗	110
第二节	中国人生社会民俗	122
第三节	中国心意信仰民俗	140
第四节	中国游乐技艺民俗	159
第九章	中国民俗学的现实应用	173
第一节	现代的经世济民之学	173
第二节	民俗与民族精神	179
第三节	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91
第四节	民俗是国家统治管理的软件	198
第五节	民俗是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支柱	202
第六节	中国民俗对文艺发展的影响	211
附录一	: 2006 年周庄年俗活动策划	223
附录二	: 读《中国民俗》	古今 234
原版后记	236
后 记	238

现代中国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和民俗学科的兴起

文明古老的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民俗的文字表述,虽然长期以来,中国不乏对民俗事像和现象的关注,但是,20世纪初以前,尚没有把它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民俗自觉意识。随着百年前中国社会的裂变转型,在思想文化萌发重大变革的前夜,一股由中国著名学者倡导,开宗明义,以乡土歌谣、民情风习、民间生活文化为学科研究对象民俗学激流,从京师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喷泻而出,冲向全国,融汇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大江中卷起一阵阵的浪潮。一些土得似乎可以掉渣的民俗,一贯因不入流而遭受冷遇,为什么会突然得到一批似乎高高在上的中国最高学府学界的青睐?强烈渴望社会改革、思想文化更新的新潮知识分子,又为什么会在新文化建设的探索中,形而下地兴起民俗自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在初创的前期,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学术取向有什么特点?对此后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认清这些问题,对于明确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和学科发展趋向不无裨益。

所谓民俗自觉意识,即是从学科角度对民俗的真切认识和整体把握。发生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前夜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就是这一民俗自觉意识的典范。

1917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纪念前后,在校长蔡元培的号召下,计划进行多种纪念活动,那时发表了歌谣采集规约,拟刊行歌谣即民谣总集和选集两种,作为其中活动之一。这也是北大歌谣运动之始。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在蔡元培先生特用《校长启事》公告的支持下,刊登了《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引起众人瞩目。歌谣征集工作由刘复、沈尹默、周作人三位教授担任编辑,钱玄同、沈兼士二位教授担任方言考订。短短两个月内,收到校内外稿子80多篇,歌谣1100余首。北大文科教授刘复先生将这些歌谣略加论订,选其最佳

者,以“歌谣选”之名,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自5月20日起,“日刊一章”,受到了校内外师生和爱好者的欢迎。后刘复赴法留学,由周作人接替他主持管理歌谣征集工作。1920年12月19日,进而组成了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由沈兼士,周作人二位教授为主任。中国现代轰轰烈烈的以歌谣名义切入民众民俗,从中挖掘新文化生命萌芽的民俗自觉意识活动在五四前后,在中国一批名流学者的积极参与下,由浅入深,蓬勃展开。到1925年,三年内成功收集全国各省的歌谣13339首,广州、厦门、杭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全国性的民俗学机构及刊物,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什么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民俗,在20世纪初的中国,堂堂正正、红红火火登上了当代最高学府——京师的北京大学的学术殿堂?这在近百年后今日学子的回眸中,也会不时闪出惊讶的目光和团团的迷惑。回顾历史的长河,中国历代不乏文人士大夫对民众风尚习俗的采撷,甚至远在周代,已有天子要求臣下“陈诗以观民风”的举措。东汉的史官应劭,在总结历朝风俗之流变中还得出了“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的精神见解。他们对民众的风俗,不可谓不重视,这难道不算是民俗的自觉意识吗?为什么20世纪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们发起的歌谣征集及研究活动,就可谓民俗自觉意识?一位哲人曾说过:感觉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到它。民俗也同样。观察、体验感觉到民俗的存在和重要性是一回事,意识到从学科角度,深刻地理解它内在的学识、学理,又是一回事。我们中国,对民俗的感悟和知觉,文字记载也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但从学科、学识、学理的构架去认识它,驾驭它,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

开此先河的应首推是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鲁迅似乎与20世纪初神州大地上中国学界的这场民俗自觉意识不搭界,实际上,他却是当时民俗自觉的首创者之一。早在1912年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一卷1期)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该文最后一章的第三节“研究事业”第二项的“国民之文艺”中写道:“当立国民美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蕴,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冀教育。”据1922年后任《歌谣》周刊编辑的常惠先生,在1961年9月《民间文学》杂志上刊登的《民间文学史话》一文回忆:北大歌谣采集活动的原因,乃系鲁迅上述的主张。而鲁迅的这一主张在1908年12月未完成的文论《破恶声论》中已初见端倪。该文以现代人性论的观念,对清政府封建强暴的政策给予尖锐的抨击。在猛烈批判其“兽性”、“奴役性”的同时,对不分青红皂白,抛弃一切民间信仰的行为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主张尊重由古以来的神话传说,强调在旧文化、旧世界的批判中保存古有的寺院神庙以及一定的民间祭祀礼法。这些构想,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而其间的一些精华又成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国国民文艺研究事业运作机制的蓝图:当立国民美术研究会。国民美术研究会,是鲁

迅的概述。从内容看,就是国民俗研究会。同年8月,也正是在时在教育部工作的兄长鲁迅的协助介绍下,周作人第一篇研究童话、关注民俗之文章《童话研究》得以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一卷7期)上发表。该文第四章,明确表示:“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阐章史事,而传说本亦得以发明。”嗣后,同年11月15日在家乡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再发表《童话略论》一文,总结性地指出:“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首次公开亮出了民俗学的旗号以及用民俗学学科理念研究古今传承的童话等民族文化艺术的学术新路。

1922年12月17日,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由周作人、沈兼士领导的歌谣研究会,决定扩大园地,刊行了《歌谣周刊》,周作人亲自起草了发刊词,其文云: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GuidoVital)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诗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周作人利用发刊词的阵地,说明了创办刊物、搜集研究歌谣在学术、文艺上的双重目的,更重要的是他借此机会,把酝酿、思考多年的有关民俗学学科意义和建设作了第一次完整的阐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个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些见解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尚无人说过。它充分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学界知识分子对民俗认知的自觉意识。这些理念就文字而言,仿佛也不复杂和深奥,但是,对刚由封建王朝脱胎而出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些鲜明的卓见,不是古代传承下来的,而是将西方先进的学科理念糅合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

周作人与兄长鲁迅一同留学日本,期间,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和日本民俗学的熏陶。据他在解放后,以周启明笔名寄给《民间文学》的回忆录讲,1906年,他在东京曾购得安德路朗著作数册,这几部著作奠定了他民俗学的理论基础。安德路朗,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派民俗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的宗教》从民俗学的分支神话学人类学派的观念出发,从一些原始部落中尚留

存的信仰推测其已被遗忘的风尚,认为童话除了它的文艺性外,还残存着原始初民的文化,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心理有着相似的契合。他归国后的童话研究就是在安德路朗学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他在《童话研究》一文中指出,“故今言童话,不能不兼及世说,而其本原解释则当于比较神话学求之。自文教大敷,群俗悉革,及今而闻在昔之谈,已谊与时湮,莫得通释,西方学者多比附事实,或寻绎语源,求通其指,而涂附之说,适长歧误,及英人安德路朗出,以人类学法为之比量。古说荒唐,今味其意,然绝域野人,独特领会,征其礼俗,诡异相类,取以印证,一一弥合,乃知神话真詮,原本风习,今所谓无稽之言,其在当时,乃实文明之信史也。”周作人童话研究“当证民俗学”之结论,即由此而来。

周作人的民俗学知识理论,又受到留学国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的影响。其兄长鲁迅也受此感染。据鲁迅《日记》1914年10月1日项下记载:“一日晴。上午寄二弟信并九月家用百元(六十三)。寄日本东京乡土研究社银三元。”次年,1915年1月8、9日项下有收到东京乡土研究社所寄杂志之事:“八日,微雪。午后至日本邮电局取《乡土研究》二十册。”“九日,微雪。上午寄二弟《乡土研究》一包。”《乡土研究》是日本民俗学初创时期的刊物,由柳田国男和高木敏雄创办。周作人对柳田国男为首的日本民俗学活动,一开始就给予深切的关注。柳田国男民俗学的奠基作,《远野物语》一共只印了350本。每一本都编了号。1935年,柳田国男在《远野物语》再版备忘录中写道:“初版的《远野物语》曾编有记号,记得从第一号的顺序开始,送给忆中的对话者(被访问者——译者注)佐佐木君数本(中略)外国人所藏很少,大概只有七八本吧,余下三百余本均分赠给亲戚知友了。”从周作人晚年所著的《知堂回想录》中我们得知《远野物语》1910年6月刊行时,在东京东乡留学的周作人曾从发行所购得一本,编号为291。周作人对日本民俗学的关心,处在日本民俗学的草创伊始,可以说,两者几乎是同步的。他对日本民俗学发展的脉络一清二楚,并对柳田国男的学问表现出极大的敬佩,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忆道:“这(《远野物语》——引者)与《石神问答》都是明治庚戌(1910年)出版,在乡土研究前创刊前三年,是柳田最早的著作,以前只有一册《后狩词记》,终于没有能够搜得。对于乡土研究的学问,我始终是外行,知道不到多少,但是柳田的学识与文章我很是钦佩,从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了不少的利益和欢乐。”实际上,周作人几乎收藏了柳田国男的全部著作,并仿佛都阅读过。从他回国后,还在不断地请兄长鲁迅从北京邮购《乡土研究》便可得知,他对柳田国男民俗学研究的关切和了解的深入。值得一提的是,柳田国男对民俗的^①研究,打的旗号是乡土研究,全国统一的学术联络机构名称,却是以柳田国男1934年问世的民俗学理论奠

^① 参阅王汝澜《日本民俗学发展概述》,《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6月版。

基作《民间传承论》移过来的“民间传承之会”。它于1935年成立,到1949年民间传承之会才改称日本民俗学会^①。在柳田国男前后,有一些日本学者将西方的Folklore译作“土俗学”、“民俗学”、“俗说学”的。但其研究的深度和特色,均不如柳田国男。周作人借民俗学之名,取柳田国男乡土研究之实,可以说将日本民俗学学理学识之精髓融会贯通。所以民俗自觉意识和学科理念,周作人是十分清楚的。说实在的,直到今天,中国学界高等学府,对民俗的认识有如周氏兄弟这样自觉意识的人也是不多的。难能可贵的是,20世纪初,持此民俗意识的人不仅仅是周氏兄弟,活跃在当年文坛上的文、史、哲各学科名流专家、学者教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兼士、常惠、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杨成志、容肇祖、姜子匡等或摇旗呐喊,或身体力行,纷纷投入其间,其阵营之强大,理念之明确,所涉之广博、成果之丰硕,在中国民俗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20世纪初北大歌谣的征集和周刊的发行,是当年中国高等学府学者教授民俗自觉意识的重大标识。而这标识的确立,时任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功不可没。严格地说,蔡元培先生不是个民俗学家,他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民俗学的研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具有民俗自觉意识。他从新历史观出发,指出“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体系,是谓文明史。”^②所以,当学者们提出这一建议时,他马上欣然同意。另外,他恐怕早已熟悉这些学人的主张,民俗自觉意识的先进者鲁迅、周作人二兄弟,作为同乡后辈,都是在他熟识的基础上先后提携进京工作的。他在教育部,邀鲁迅前往,他到北大当校长,闲赋在家的周作人得到他的协助进北大当教授。周氏兄弟能先后倡导民俗学,与蔡元培的眼光和扶植是分不开的。同时,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的编辑们李大钊等人,也是用同样的态度,支持歌谣的征集和出版研究,显示了顺应科学的民俗自觉意识。对此,胡适的态度和立场更为鲜明,也更具代表性。胡适虽然也不是专攻民俗学的专家,但是,他的学术倾向,使他一度成为民俗自觉意识的急先锋和中流砥柱。他因为鼓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便对民俗学内的民间文艺及相关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他在1929年讲学基础上撰写并积极宣传的《白话文学史》在学理上与民间文艺有诸多相通之处。民俗学科,为他在白话文研究上增添了理论依据和生动的文艺素材,也为他打通与民间文艺的联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航道。如他撰写的《歌谣的比较法研究》、《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等著名文章,一时脍炙人口。也许,胡适是个名流,他的一言一行更引人注目。这位在美国学哲学归来的洋博

^① 参阅王汝澜《日本民俗学发展概述》,《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6月版。

^② 高平步编《蔡元培史学论文集》第13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士,主动地关照下里巴人的民俗民间文艺,缕析其艺术的精华,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营造了新的生机。并在1936年,《歌谣》周刊死而复生的关键时刻,亲自挂甲上阵,为其撰写复刊词,竭力扶植歌谣的新生,指明它的发展方向。虽然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复刊词渗透了他在民俗学内容上个人的学术偏爱,但这一切,无损于他在此表现出的高度民俗自觉意识和远见卓识。

令今天学界回味无穷的是,20世纪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流溢,大多学者之前或之后,都不是专门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他们中间有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除前面已介绍的,另外,如刘复、钱玄同专长是语言文字学,顾颉刚是历史学,江绍原是宗教学、钟敬文是文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门新学科初创时期的必然现象^①,我以为这恐怕还仅仅是表面的现象,其实质,还在于学人们对民俗有了全新的学理认识有莫大的关系。限于篇幅,不一一解析了。

二

20世纪中国学界的民俗自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之所以能发生,除了前文所述倡导者的学科意识,名流学者们鼓吹宣扬积极投入之外,还得力于清末民初严复等爱国志士“富国强民”思想主张的滥觞,世纪初激进知识分子国民性改造的理想的驱使。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交替中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生在清季国势颓败情势中的严复,既有深厚的国学传统,又西渡留洋,摄有欧洲的文明思想。面对政府的腐败无能,西方列国的恃强欺弱,频频侵略,内心悲壮而凄凉。为“保种保国”他提出了“民德”、“民智”、“民力”的基本概念来实现他的“救亡”理想。在西方文明的社会契约论及国民观的影响下,他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源在于“民”。国民是国家强盛、民族独立之“本”。故强调要对国民实行启蒙教育,提高“民”的素质,他以为,若民质低下,即使圣人出现,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政策,“一人治百所不和”,仍无法见效。严复的国民观,是依据儒家“民为贵”的观念来诠释欧洲文明中的国民理念,故侧重点,不在于个体的民,而在于一种集团的“群”概念的民。提高民质,也就是提高群体的民众素质。而其民质的三个方面,他是依据斯宾塞《教育论》中“力”、“智”、“德”的三要素制定的。他说“《明民论》者(即斯宾塞《教育论》——引者注),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②但在严复

^① 赵世瑜《中国现代民俗学初创时期的多学科参与》,《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2期。

^②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拭编《严复集》第1册,第17—18页。

的思考中,这“三民”的原则,也是在群而不是个人。他说“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本斯而谈,断可识矣。盖民生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①他还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②他把他的“三民”理论,作为强国的关键性方针和政策,竭力鼓吹宣扬,一时在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严复后期思想趋向保守,但他富国强民的革新主张,久久回荡在中国大地上。毛泽东也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生活在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严复“三民”国民观的启蒙教育。直到解放后,由毛泽东提倡的“三好”学生的标准,内涵上,是以严复“三民”思想教育标准为基础的。“三民”思想在 20 世纪初的学界为人所熟识。而民俗学此后之所以在当时被学界不同学科的人所共识,所认同,与这“三民”思想有着学理上的一致和内在的天然联系。因为民俗学之“民”,就是群体的民众,国民之民,它所研究的“俗”本身就是一国民众——民力、民智、民德生活经验积累的学问。而且是一门道道地地专门搜集、研究民众知识智慧的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现实中去“民学”^③。

民俗学,国际术语 Folklore,英文原本的文字含意,就是民众的智慧。它是由两个撒克逊词“Folk”和“lore”合成而成。Folk 来源于古英语中的“Folc”。据推测,该词源自日耳曼语的“fulca -”,即“一大群武士”、“许多战士”,可见,词源最初就赋予“Folk”“群体”的本质属性,与“Folk”相应的德语为“Volk”,该词除了“人民”、“民族、群众”的意义以外,百姓甚至被理解为乡民、农民、陋民、愚民。理论学界扩展为民众^④。而 lore,即为知识、学问。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原美国民俗学会主席,《世界民俗学》一书的作者阿伦·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自一八四六年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最早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个词语以来,关于民俗学定义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很多定义侧重在“知识”(lore)方面,也有一些侧重在“民众”(Folk)方面。关于“知识——是着重在民俗学的资料,

① 严复《原强》修定稿,王拭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17—18 页。

② 严复《原强》修定稿,王拭编《严复集》第 1 册,第 27 页。

③ 江绍原《关于 Folklore, Volkskunde 和“民学”的讨论》,见《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附录七”,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3 年 6 月。

④ 据《Klein's Comprehensiv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Elsevier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folk, n. - ME. Fr. OE. folc, 'people, crowd', rel. to ON. G. volk, 'people', fr. Teut. *fulka -. Which prob. meant org. 'host of warriors'

而不是着重在使用这些资料的人——的介绍，曾涉及它的起源、形式、传承以及作用”^①。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学科的定义不免有歧义，但是，总的倾向，大多数的意见还是明确的，就民俗学而言，主要是有关人民知识的学问。

20世纪初，中国学界民俗自觉意识的发生就是建立在对民俗知识的理解和“强民”理念之上的。当今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俗学界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因而在总的倾向上，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进升至 Folklore 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今天，是应当觉醒和认真加以调整的时候了。”^②作者的一些见解是很精辟的，对中国当代的学术取向有振聋发聩之处，这暂且不表。但断言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学“缺乏明晰的认识”没有把握民俗学“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我们尚不敢苟同。我们以为对此要作科学的查证和历史的分析，不能这样笼统，一概而论。

对于 Folklore 的正确理解，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在推进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进行过大量的探讨。杨成志曾对英、法、德、比、意、西、荷等西方诸国的名谓内涵都作过专门的比较与介绍，出了专门介绍西方民俗学流派的《民俗学问题格》的译作，发表了《现代民俗学的历史与名词》的文章。江绍源对民俗学的基础理论作了详细的研究。周作人将日本学者对 Folklore 的译名——民俗学引入中国，中国学者一时并未完全认同。1921 年 1 月胡愈之先生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论民间文学》一文，认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 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近世，欧美学者知道民间文学有重要的价值，便起用科学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后来研究的人渐多，这种事业，差不多已成了一门专门科学，在英文便叫‘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但这是很勉强的。”事实的确如此，英文 Folklore 的研究范围广泛，很难用相应的中文去推定。用什么名谓界定，江绍原曾提倡和使用“谣俗学”和“民学”。并为此与友人就国际不同国家及国内对 Folklore 的不同内涵的表述展开过认真深入的研讨。他们认为：“德语 Volkskunde 的涵义较英语 Folklore 的为广，虽则最近英之瑞爱德，比之范燕奈和美之克拉普所给 Folklore 的意义，已渐与 Volkskunde 的一致。中国研究者今后将采取哪个说法，自当早一点决定（芬兰学派固然还墨守 Folklore 的旧界说，但是让我们别忘记^①此派的‘史地方法’其应用范围可以极广，^②一个学科的项目可以多到不是每个学人所能全研究或全懂，和^③Krohn 的年纪恐已经很大）。又此学普通称‘民俗学’，从日本译名也。然日本人所谓民俗，虽有时是民间——

① [美]阿伦·邓迪斯《什么是民俗？》，《民俗学译丛》第一辑，第6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俗学会1982年。

②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山东大学。

俗间的意思,移植到中国来,却颇有被误解为民间风俗之危险。中国研究者是可以不理睬这层呢?还是痛快点自行定名,也应早日决定(德文中‘比较民学’一名,很可以介绍到中国来。)”^①“我个人提议名此为‘民学’,下了一个范围似乎比德国民学还要方广的定义。”^②显然,Folklore 是外来的学科,如何用中文去科学地说明,颇费周折。因为 Folklore 所关注的,不仅是民间文学,也不仅是民间风俗,在江绍原的学科理念中“就最近最新的民学界说和民学观点看来,则合乎制度本身便是展于民学范围之内,民学非他,研究民间一切生活状态法则、观念形态、情感表现者也。”^③总之,民众的一切传承性生活文化知识,都是研究的对象。综合国际不同国家诸多学派的定义和名称及国内已有的表述,江绍原百思斟酌,予以“民学”的称谓。但自己也感到自己的这一概念,未必能盖全,并为国人所理解。故在与同仁、河南省立民众师范学院樊演等先生反复商榷后,最终还是用了民俗学^④。因为无论是用民情学、谣俗学,还是民学,无非是对当时国际性学科 Folklore 作出更科学合理的概述。名实之间,“实”恐怕更重要,因为这三种表述,都没有把 Folklore 限定在民间文学或风尚习俗层面。由此可知,20 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的先行者们在名称、内涵上虽有歧义,但总体的认识却是与国际学界“民众知识”的理念同步的。

作为民俗学的倡导者之一的周作人,虽然第一个沿用日本 Folklore 的译名“民俗学”后,并没有对它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文人气质特浓的周作人有更多的诗人才华,却似乎缺少理性思辨的特质——恐怕他也不大愿意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此,我们今天只能面对这一现实。但是,这一现实并不是说周作人对民俗学的国际内涵不甚了解,糊里糊涂,以中国传统民间风俗置换之。且不用说,周作人的相关著作中没发现这样不清的说道,相反,从他论述民俗学的有关意见及以后的反思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周作人对西方和日本民俗学及民俗的民众知识的内涵,是极其明白的,他认为利用这方面的知识,对国民性的提高,是大有益处的,而且,这是他认为最好的“强民”途径。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道:“有如民俗学本发源于西欧,涉猎神话传说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的时候,便碰见好些交叉的处所,现在却又来提起日本乡土研究,并不单因二者学风稍殊之故,乃是别有理由的。乡土研究刊行的初期,如南方熊楠那些论文,古今内外的引证,本是旧民俗学的一路,柳田国男的主张逐渐确立,成为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名称亦归结于民间传承。我们对于日本感觉兴味,想要了解它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方面摸索很久之后,觉得事倍功

① 《江绍原民俗学论文集》,第 24、25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② 同上。

③ 江绍原《民学与合作研究》,杭州《民国日报》1930 年第 15 期《民俗周刊》。

④ 关于 Folklore, Volkskunde, 和“民学”的讨论,见《现英吉利及谣俗学》“附录七”,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3 年 6 月。

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人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急切不能直入,则先注意于其上下四旁,民间传承正是绝好的一条路径。”

这实际上是周作人 20 世纪初大力倡导民俗学的内在的理性依据。所谓“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和“民间传承”这是柳田国男民俗学的一种表述。他与旧民俗学——把“民间古俗”为研究的唯一对像,有明显的差别。熊楠等旧民俗学者,像欧洲早期的民俗学同行,把尺度的标准停滞在古俗的调查上,“只是用猎奇的眼光要从探索人类原始思想。柳田则尊重村民,对民族基层文化采取了积极的分析研究态度。柳田以群众为师的恭谨态度,为后学者树立了良好榜样,也是他日后取得卓越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①柳田国男对民众的民俗,视作与人息息相关、代代传承的知识文化加以尊重和搜集研究的。在他看来,日本人之所以为日本人,日本人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都与民俗——民间传承的扶托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他利用这些民俗材料,写下了《日本人》、《海上之路》等大批有关日本国民生存方式、日本固生活技艺、日本人源起和国民性的专著,对日本现代思想文化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授予文化勋章,成为全日本唯一享受此殊荣的人。所以,周作人接触日本民俗学时,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刚起步不久,他能慧眼独识,在看好柳田国男,大力提供民俗学时,柳田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有名气,究其原因,在于周作人对民俗学有了系统深入的认识。特别是民俗学具有能解读民众智慧,为民造福的前卫意识。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各学科的著名学者专家之所以一下认同了民俗学,主要原因也在于它关注的是民众的知识学问。而这又和自严复以来爱国志士们富国强民的改革主张和国民性改造的社会舆论是相呼应的。学者们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那些不为人瞩目的民众的民俗,蕴涵着珍贵的知识财富,将它的价值发掘出来,公布于众,本身就是“强民”改造国民性的重大举措。

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从事民俗学研究的经历便是一个明证。顾颉刚先生是 20 世纪初中国民俗自觉意识的一员健将。他从小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在苏州农村养病中,接触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信仰等民俗资料,决心要把它记录下来,为民鼓与呼。1918 年,他在北大读书时,就积极投入大学歌谣征集的活动。1920 年郭绍虞先生在《晨报》上介绍发表了顾先生搜集的歌谣,创当时大报刊歌谣之先河,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注意。1922 年《歌谣》周刊创办后,顾先生得以参加编辑部的编辑工作。以后他又从搜集的歌谣中选了百首,编为《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上连载,1926 年 7 月,又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印为专书出版。胡适亲自为他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该书“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②1924 年,他任北

① 王汝澜《日本民俗学发展概论》,《民俗学讲演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年 6 月版。

② 胡适《吴歌甲集·序》,《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同时编辑《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又作《孟姜女故事转变》^①引起了学界的巨大震动。因为他用史学与民俗学结合的科学方法,对社会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使人耳目一新。当时在巴黎留学的刘复先生写信道:“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第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②1925年,他受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之托,与同人到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作《妙峰山的香会》的调查报告,编入《妙峰山进香专号》,对民间信仰作了实地调查和科学的分析。他认为不能讥笑从妙峰山下来的人戴的红花为野蛮而尊重耶稣圣诞节的圣诞树为文明,不能斥责《京报》中的《妙峰山专号》为下俗而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他从歌谣、传说、民间信仰切入到历史学的研究,为新的民俗学和国学打开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之风。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顾颉刚先生有了民俗学的学理基础,深切了解民众民俗所具有的人民智慧和历史价值。他在1926编撰的《古史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古史的计划》中公示:“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得到了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1928年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创办之时,由他执笔撰写的发刊词中,他慷慨陈辞,宣称道:

“我们读尽了经史百家,得到的是什么印像?呵,是皇帝,士大夫,贞节妇女,僧道——这些圣贤们的故事和礼法!

人间社会只有这一点么?呸,这说那里话!人间社会大得很,这仅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大半是虚伪的!尚有一大部分是农夫、工农、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奴婢、堕民、罪犯、小孩……们,他们有无穷广大的生活,他们有热烈的情感,有爽直性子,他们的生活除了模仿士大夫之外是真诚的!

这些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呢?……

这班小民永远低了头守着卑贱的本分呢?不,皇帝打倒了,士大夫们随着跌翻了,小民的地位却提高了;到了现在,他们自己的面目和心情都可以透露出来了!

我们采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

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

我们要探捡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

① 载于《歌谣》周刊第六九号1924年版。

② 刘复《敦煌写本之中的孟姜女小唱》,《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在顾颉刚的心目中,民众传统的生活文化创造积累了丰富的有价值的知识财富,通过民俗学研究,就可以“透露出来了”,并以此来书写新的民众历史。

富国强民是清末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爱国志士的共同愿望,但是“强民”和国民性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上而下对民众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将由民间传承的,千万年以来民众有价值的生活文化之经验挖掘出来,发扬光大。顾颉刚先生以历史学与民俗学相交叉的学术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作了很好的回答。20世纪初其他学科的一些专家如江绍原以宗教学与民俗学相交叉的思索,也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他的专著《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及《血与天癸》、《“盟”与“诅”》、《端午竞渡本意考》、《礼俗迷信之研究概说》、《中国古占卜术研究》、《关于殷王亥传说的研究》等数百篇相关的文章,成为中国礼俗迷信研究及宗教学的权威。其成就“堪与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王国维对中国戏曲史研究之成就相媲美”。胡适在1928年4月23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之《图书使用法》一文中说:“像我的朋友江绍原从小问题做起,专研究胡子、头发、手指在中国历史上的迷信,成为一个系统,于是二千五百年的东西都活了。”^①江绍原研究中国传统的古俗迷信,并不是为了猎奇,他筚路蓝缕,上下几千年,为的是寻根溯源,祛邪扶正,为建设新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服务。他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五四运动时,他是冲入卖国贼住宅,火烧赵家楼而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的大学生之一。他一生追求民主、进步,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关注与民众切切相关的学问。20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的先辈们民俗自觉意识就是在富国强民提高国民性理想愿望的推动驱使下勃发的。

三

20世纪初,在民俗自觉意识的带动下,中国民俗学界的学术取向,虽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而结出诸多的成果,但其主流,确实是向文学倾斜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民俗学这一学术趋向呢?以我观之:首先,中国现代引入西方民俗学科,是从“文学切入”的^②。

日本民俗学权威,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交往甚密切的学术前辈直江广治教授指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始,是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深相连的。

① 王文宝《江绍原民俗学论文集·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② 钟敬文《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和体会》,北京师范大学报,1998年6期。